泉下总宜寻骨肉

——黄炎培痛吊黄方刚记

李家俊

1944年1月17日，黄炎培先生的长子、著名哲学家、武汉大学教授黄方刚病逝于乐山。1944年3月，黄炎培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到乐山，两度赴黄方刚墓前悼念，白发人吊黑发人，马鞍山下一片悲怆。

一九二九年黄炎培全家照，后排右二为黄方刚

黄方刚客死乐山

黄方刚是著名的哲学家。1915年至1923年在清华学堂学习，受教于梁启超先生，并与梁思成是同学。1924年入美国卡尔登大学获文科学士学位，1928年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。归国后在马君武创办的广西大学任英文教师，后受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之邀，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黄方刚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、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。1938年，东北大学迁到四川三台县，其文学院更名为文理学院，黄方刚继续任文理学院院长。

黄方刚一生勤奋，著述颇丰，代表著作有《苏格拉底》《道德学》《<老子>年代之考证》《知行难易解》等。

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武汉岌岌可危。武汉大学召开校务会议，决定迁校至四川乐山。1938年3月，武汉大学部分教职员工与学生共600余人乘船抵达乐山，将文庙作为校本部、图书馆及文学院和法学院的教学地址，理学院在高西门外的李公祠办学，工学院选择在三育学校，男生宿舍在龙神祠，女生宿舍选在白塔街，教师们则分散租用民房。就这样，国立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8年的异地教学。1939年黄方刚与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观点不合，辞去文理学院院长，受聘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。

抗战期间，法币贬值，乐山物价飞涨，百姓生活维艰。黄炎培在重庆，黄方刚在乐山，父子常以信互慰互勉。1941年1月，黄方刚专程赴重庆探望黄炎培，父子二人聚少离多，黄炎培特别陪黄方刚到附近游玩并题诗留念。1943年夏秋之际，黄方刚从成都回到乐山，感觉身体不适，诊断为心脏病，断断续续服药治疗半年多。1944年初，手指出现血斑，病情加剧。

这期间黄炎培十分焦虑，多次写信询问治疗情况。1944年1月17日黄炎培托人给黄方刚汇去了3000元，要黄方刚转院治疗，哪知就在这天午后，黄方刚病情突变，在乐山病故。

黄炎培赴川凭吊

1944年1月18日夜，黄炎培收到两封电报，是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和乐山补训处长韩学源电，告知黄方刚病逝的噩耗。黄炎培获悉后悲痛万分，冷静下来，即刻复电并汇款50000元，请王星拱代办丧事。

当夜，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："方刚！方刚！你舍父就母去呀。"（黄炎培结发之妻、黄方刚生母王纠思于1940年因脑溢血在上海病逝）

1月19日，黄炎培强忍悲痛，亲笔写下了《讣告》：

长儿方刚，研习哲学，历任广西、东北、北京、四川、武汉各国立大学及华西大学教授，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，不幸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教授任内病故，计前后执教十六年，得年四三岁，遗妻一，男三均幼，除命次三两儿前往料理殓葬并郑重搜行其遗著外，谨此哀告诸亲友矜鉴。黄炎培。

讣告在《中央日报》和《大公报》连续发布了3天，同时，黄炎培向参政会告假，"心中无一刻不念亡儿"，迫不及待地要奔赴乐山。当时乐山的交通非常不便，黄炎培的四儿子黄万里替父先行，打算先行乘公共汽车去乐山，却买不到车票，于是与总部在重庆的中国银行接洽，搭便车经内江达乐山。

黄方刚英年早逝，在社会上引起震惊，时任教育部次长、中央大学校长、著名学者顾毓琇写《悼黄方刚》，深表哀悼之情：

彭殇修短倘前知，柱下精研枉作师；
岂信著书能却病，犹怜好学每忘饥。
家贫儿让山中果，世乱妻吟海外诗；
呜咽长江怀故友，清明时节雨如丝。

这期间黄炎培如坐针毡，他不停地翻阅黄方刚的遗著，不断地写《方刚哀记》分赠友人：

方刚一生清正，诚爱待人，蓄学抱道，朗观有得，为文化服务，到死方休。虽享年不永，亦可以无愧于人，无愧于天地。

长儿方刚，穷研哲学，为大学教授凡十六年。民纪三十三年一月十七日病殇于四川乐山，年四十三。黄炎培哀记。

2月1日，黄炎培接到黄万里从成都发来的电报，告知黄方刚已安葬在嘉定乌尤寺后山。虽入土为安，黄炎培仍决意无论道路多么艰难也要赴乐山凭吊。

2月8日黄炎培收拾好行李，偕夫人姚维钧按约定乘坐花纱布管制局蓉运处的车转道成都，却因车辆纠纷未能够成行。经多方协调，次日上午十点得以开车。令黄炎培始料未及的是，车行手续十分繁杂，沿途检查岗亭众多，证件稽核多如牛毛，幸好检查人员要么是黄炎培的门生，要么读过黄炎培的书，对黄炎培尊敬有加，纷纷提供方便，这才到了璧山县。第二天经永川、荣昌、隆昌，夜宿内江。思念亡子，黄炎培吟出了诗句：

泉下总宜寻骨肉，云瑞忍复望城媚。
艰难远道疲驴力，渐愧吾生强自支。

11日黄炎培离开内江，过球溪入资中，夜停简阳，12日抵达成都，与黄万里会合，儿子向父亲报告了黄方刚安葬的具体事宜。

黄炎培于2月27日下午在成都陕西街燕京大学会议室举行黄方刚追思会，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、教育家刘绍禹等社会名流出现，席间黄炎培向各界人士对黄方刚身前生后的关心帮助深表谢意。

3月5日，暂编十八师师长刘树成提供小车一部，黄炎培从成都出发，视察了正在建设的新津机场，直赴乐山。

黄炎培痛吊爱子

1944年2月6日，黄炎培在乐山拜会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、教务长朱光潜等，下午，黄炎培携黄方刚遗孀薇兰及黄方刚的三个儿子，从萧公嘴渡江到乌尤寺，过东坡楼下篦子街，车行三里路再步行半里到达瓦厂坝，在李氏旧宅旁的黄方刚墓前祭奠，三代人追忆黄方刚的正直与勤奋，悲伤之处不免泪流满面。痛失爱子、丈夫、父亲，一家人失声痛哭。

献花行礼之后，黄炎培在黄方刚墓前告诫三个孙子：你们须念父亲生前做人，怎样端正做学问、怎样踏实，怎样一心教授。宁使贫不就他职，不取分外的钱，怎样待人好，诚恳忠实，怎样教人好，至诚亲切，你们想念父亲，须和父亲为人样好，这就是安慰已死的父亲，也是安慰生存的母亲。你们的祖父老了，就是希望你们这一些。

3月9日，黄炎培一行从萧公嘴登船，至川嘉造纸厂码头登岸，再经过嘉华水泥厂，从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行至马鞍山麓的黄方刚墓地。据黄炎培日记记载：墓室由嘉华水泥厂工程师赖圣功设计，长方形，前平后圆，两侧长一丈二，高四尺。墓正对大庙山，天晴时可望见峨眉山。

白发人吊黑发人，其情其景令人伤心流泪。凭吊时，大家噙着眼泪默默地向黄方刚的墓碑献花，行鞠躬礼。

赠送墓地的主人叫李树芳，系黄方刚的门生，他是前清内阁中书李嘉秀进士的后人。因此之故，黄炎培认为李家系老子李耳的传人，黄方刚一生研究老子，以翻译老子的作品著名，死后葬于李氏墓地，归宗老子，算是一番慰藉。黄炎培强忍悲伤亲自为黄方刚题写墓志铭："方刚，一生清正，抱道有得，言行一致，诚爱待人，取物不苟，著书讲学，到死方休。虽其年不永，亦可以无愧于人，无愧于天地。"

悼念结束后，黄炎培对李树芳十分感激，题《尊到贵德》回赠：

中华民国纪元三十三年一月，长儿方刚在全国对日苦战中，以守职安贫殁于乐山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席次，及门李生树芳得其伯叔昆弟之同意，慨然以其祖遗乐山凌云乡东道精庐旧宅余地赠与。营葬既毕，率孙儿十九、海川、馄江街哀叩谢，并接受赠与文约。方刚既以道见尊于李生，李生之德弥复可贵。因取李祖老子此语书赠，以扬家风而志高义。

夜晚，心情沉重的黄炎培从柜中检点黄方刚的遗物，发现许多遗著，不觉老泪纵横，一边清理，一边编写目录，足足写了4页纸。感叹"最光荣是对国家、对人类有切实的贡献，把我聪明才力都贡去"。

儿子早逝，其悲怆之情挥之不去，3月22日黄炎培含泪写下《哭方刚墓》：

墓在乐山凌云乡公路旁，西距马鞍山一公里许，西北距乌尤寺下岷、铜、雅江会合处二公里许。
生不求人强自支，死留清蜕伴峨屑；
三江窈窕堪遗世，百卷丛残欲付谁？
最后解人空尔案，诸生庐此复美辞：
王师大定中原日，翻待衰公祭告儿。

方刚治哲学，以解答最后问题自任。

诗末尾注解："墓地其弟子李生树芳所赠，李宅在焉。"

（作者单位：民建峨眉山市总支部）

我在邓子恢家做客

林跃鸿

1966年10月2日，我和同学邓利英等10人，由福建龙岩县东肖中学数学老师饶连金带领赴京，邓坤副县长给其堂兄邓子恢写了便信，去龙岩老乡邓子恢家做客。

到了北京，我们住在北京煤炭工业部研究所。10月8日早上，我和邓利英乘公共汽车去万寿路10号邓子恢的住处——北京红旗通用机械厂边的小巷子。在向卫兵说明我们来自龙岩之后，不到3分钟，邓夫人陈兰就来门口接我们。陈兰阿姨身穿大襟衣，脚穿布鞋，牵着邓利英的手，热情地让我走在前面；进入客厅，陈兰阿姨喊："子恢，老家来客人啦！"邓老身穿中山装、脚穿布鞋、面带和蔼的笑容，走出来与我们握手，热情地请我们坐在他身边，并对小女儿邓小燕说，龙岩老家来的客人，你应该叫哥哥，叫姐姐。随后，邓老和我们拉起家常。

邓老问我们："老家东肖镇的赶集还是逢二、七吧？"我说："是的，还是逢二逢七赶集。"他接着问："那老家东肖镇的豆腐花、咸酥花生、萝卜丝红烧肉还有吗？"我和邓利英异口同声地回答说："有，我们都很喜欢。"他接着说："我和陈兰最爱老家的豆腐花啦，现在还不时让厨师专门加工。我们龙岩县人民的生活怎么样？可以吃饱吗？"我回答说："白米饭是少一点，地瓜丝饭、菜稀饭管饱没有问题。"邓老说："能吃饱那就好了，比起我们闹革命时算是好多了，相信人民以后三餐都会吃上白米饭的。"他继续问道："那你们穿衣还有困难吗？"我们说："每人有定额发布票，虽然是紧点，但缝缝补补可以穿。"邓老说："艰苦朴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现实，我们中国总有一天会富强的。"

过了一会儿，邓老问我："小林，你是哪里人呀？怎么会到我老家东肖镇来念书呢？"我回答："我是苏坂公社美山大队的，美山以前也叫赤美山。我中考没考好，成绩未达一中、二中录取线，就被您老家的东肖中学录取了。"邓老风趣地说："呵呵，这说明我们有缘，不然今天我们也就无缘相见。我老家东肖镇是革命老区，又是侨乡，东肖中学也是一所好学校，你要好好学习哦。"

临近中午时分，邓老留我们吃午饭。陈兰阿姨亲自和厨师一起上菜，热情地为我们盛饭、夹菜，口中说着："慢慢吃，要吃饱。"邓老说："没什么好吃的，多吃几个馒头。"那时，我们只不过是来自他家乡的普通中学生，邓老和他夫人这般盛情接待，和蔼可亲、关心的话语，句句入人心坎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那时我们也知道，邓老长年累月忙于国家大事，很少关心自己，身体也有异样。为了不影响他老人家休息，我们吃饭之后就起身告辞："谢谢邓老，感谢您和陈兰阿姨的热情接待，请保重身体！"邓老紧紧握着我的双手说："好的，好的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我会注意的，希望你们也好好学习，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！"

几十年来，邓老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。前一段时间，我与一起到北京的邓利英同学相聚时，重温了这段经历。邓老那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的声音，仍然温暖人心！

（作者系福建省龙岩市东肖中学退休教师）

文人轶事 WENRENYISHI

李大钊乐善好施

张　雨

1916年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一职，两年后被评为教授，月工资200元，加上他在其他学校的兼职，每月收入300余元，这在当时收入并不低。但他生活俭朴，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支持党的工作，或用来帮助同志，救济贫苦青年等。他同时代的人这样描述他："黄卷青灯，茹苦食淡，冬一絮衣，夏一布衫，为庶民求解放，一生辛苦艰难。"这就是李大钊当时真实生活的描述。

共产党小组成立时，因缺少经费，李大钊每月从工资中拿出80元，用于会务、印刷宣传品、交通食宿等开销。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时，也是李大钊资助并筹措解决经费困难。许多人知道李大钊乐善好施，每逢遇到困难时便去找他。李大钊来者不拒，如果手头没钱，他就写个借条让对方到北大会计室领取，发工资时再让会计把上月借的钱扣除。他总是替别人着想，就如爱因斯坦所说："对于我来说，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，忧他人之忧，乐他人之乐。"将心比心，慈悲为怀。许多人心疼他的做法，担心长期下去，他们家的生活会受到影响。

令人叹息的是，每月发薪水时，李大钊领到的往往是一大堆借条，拿不到几个现钱。可见李大钊因为经常帮助别人，全家人的生活确实受到了极大影响。

1927年4月28日，李大钊牺牲在绞刑架上，年仅38岁。"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"成为他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李大钊牺牲后，中外记者纷纷来到他租住的家中采访，看到的却是李家家徒四壁、一贫如洗的景象。记者们惊讶不已，唏嘘不已：李大钊作为北大的知名教授，家中为何如此寒酸？

李大钊的乐善好施足以让他的品德彪炳千古，让人尊崇，令人钦仰！

文人轶事 WENRENYISHI

钱锺书给胡乔木改诗

崔鹤同

胡乔木与钱锺书是清华同学，钱锺书比胡乔木高一届，但两人在学校时并不认识，直到1972年钱锺书回到北京后才与胡乔木交往，以后逐渐增多。晚年胡乔木常到钱锺书家中聊天，无拘无束、谈笑风生、亲密无间。

1982年6月1日，是胡乔木七十寿辰。生日到来前，胡乔木心潮澎湃，诗兴大发，写了七律《有所思》四首。诗写好后，像往常一样，送钱锺书阅改。钱锺书收到后，毫不客气，按自己的心境，大刀阔斧，改得密密麻麻，就连胡乔木最得意的一些诗句也改了。

胡乔木是一个极有礼貌的人，这就出现了"我诚心请你改诗，你也费心改了；我期期以为不可，但又怎么好意思请你再改回去呢"的尴尬局面。胡乔木为此十分踌躇。无奈之下，他不得不求助于与钱锺书关系甚密的李慎之帮他解围。

李慎之对二人是了解的。他知道胡乔木的四首《有所思》，实际上是他70岁的人生总结，是他的平生自叙。胡乔木与钱锺书虽然谊属清华校友，但是两人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：一个投身革命，一个矢志学问。两人之间的差别，有感而发的诗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和意境。钱锺书本来十分了然，这一次似乎完全忘却了，就像改自己的诗那样，"凭着感觉走"，只顾一东二冬、平平仄仄，由兴改去。

6月12日，李慎之来到钱家充当"说客"。他与钱锺书同乡同谊，比钱小13岁，一向"倚小卖小"、直来直去，以钱锺书的绝顶聪明，不等李慎之把话说完，已经完全明白。之后，钱锺书与李慎之二人一起先恢复原文，再选择他俩共同认为不妥的地方改了几个字（如将第一首的末句"弦断琴亡志亦酬"改为"弦急琴摧志亦酬"。因"断弦"多指丧妻与作者原意不符），这样稍做改动后由李慎之带回给胡乔木。胡乔木非常高兴。不久发表在7月1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。1992年准备出版诗词集时，胡乔木采纳了钱锺书的意见，将《有所思》改为《有思》。

文人轶事 WENRENYISHI

郑振铎心系文物保护

顾　燕

郑振铎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和第一届理事会理事，是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郑振铎曾担任人民政协文教组长、文化部副部长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等职。

后来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回忆郑振铎说，新中国成立初，那时候，文物局刚刚筹建，总共没几个人，郑振铎曾对谢辰生说："现在文物局里完全懂的人还不多，你就在这儿搞。"他还说："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，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。你搞文物的保护也是个重要的事，就在这儿干着吧，现在人也缺。文物保护很重要，你不要认为这不是学问。"谢辰生听从了郑振铎的话，一辈子与文物打交道，后来也成为大家。

对文物保护，郑振铎时时亲赴基层调查研究。1953年夏，时任徐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王肯堂到北京，去文化部文物局汇报工作，主要商谈茅村汉画像石墓的保护问题。郑振铎先生亲自接待，细心地听取了情况汇报，此后郑振铎一直心系徐州文物保护工作。

1956年4月2日，郑振铎自开封抵徐州，历时7个小时。然而此前，郑振铎先生"微有腹疾"，也就是身体状况并不好，但他坚持了下来。在当天的日记里，郑振铎写道："（自开封）12点18分开车。沿途景色，无甚可观者。过兰封、中权、商丘、黄口等，到徐州时，天色已黑矣。有市委书记及市文教处长来接。住招待所。九时半，睡。"可以说是非常辛苦。

考察的结果并不乐观。4月3日下午，到茅村汉墓，"打开了门，才见出此墓之弘伟"，但"凡五室，只三室有画像"，特意注明余皆散遗农家、小学中，而"农人打井要用石，闻铜山县因打井发现一画像石墓，农人拟取出圈井。正阻止之"。"有一石窗，可考见汉制。画像极生动，马的姿势尤好"。郑振铎先生甚喜，"徘徊半小时而出"。时间到了1956年6月，为加强汉画像石的保护，根据郑振铎先生指示，成立"江苏省徐州汉画像石保管组"，办公地点设在云龙山下的乾隆行宫。作为汉代三绝、江苏三宝之一的徐州汉画像石保护工作，在郑振铎的亲自关照下，终于得到了有力的保护。

文人轶事 WENRENYISHI

汪曾祺的爱好

王　剑

汪曾祺的小说《受戒》发表后，一时名满天下，被誉为"文狐"。有人向他请教写作的秘诀，他谦虚作答："我事写作，原因无它：从小到大，数学不佳。考入大学，成天泡茶。读中文系，看书很杂。有何风格？兼容并纳。不今不古，文俗则雅。与人无争，性情通达。如此而已，实在无啥。"

除写作之外，汪曾祺还有三大爱好：写写字儿，画画画儿，做做菜。

汪曾祺的字是有童子功的。小时候他曾跟韦先生学写魏碑，练过很长时期的《张猛龙碑》，每天一大张，使他受益终身。汪曾祺平日给人写字，多为行书，小条幅，四尺宣纸一裁为四。他把书桌上书籍信函往边上一推，摊开纸就写。偶尔也写对联。字迹清秀，颇似明人书法。

汪曾祺画画，没有真正的师承。他父亲汪菊生是个画家，画写意花卉。他小时爱看父亲画画，看怎样布局，画花头，定枝梗，布叶，勾筋，收拾，题款，盖印。看得久了，汪曾祺就对用墨、用水、用色，略有领会。写作有了名气，求画的人渐多。不过，汪曾祺认为自己的画"不中不西，不今不古，遣兴而已，没有什么看头"。他请人刻一闲章："只可自怡悦"，专门用来押角。正如他的自述诗所说："写作颇勤快，人间送小温。或时有佳兴，伸纸画芳春。草花随日见，鱼鸟略似真。唯求俗可耐，宁计故为新。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"

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称。他每到一处，专走小街偏巷，品尝民间小吃，每每陶醉其间，自得其乐。他不仅会吃，还专门研究菜式，做给朋友家人吃。拌荠菜、干贝烧小萝卜、白菜丸子汤、风鸡烩双笋、水煮牛肉、塞肉回锅油条，都是他的拿手菜。他在作品中也总是展现各式各样的美食：萝卜、黄瓜、鱼、豆腐、韭菜花、手把肉、昆明的米线、北京的酱菜。有一次，作家聂华苓到北京小住，汪曾祺为她做了一道"干贝烧小萝卜"，聂华苓吃得非常开心，最后连一点儿汤汁都端起来喝了。